

评析本
白话

公羊传·穀梁传

.04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评析本春秋公羊传
白话穀梁传

主 编 王 宁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评析本白话《春秋公羊传·穀梁传》

王宁 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1号)

北京市经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14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书号 ISBN7-81004-504-O/B·58

定价:7.65元

评析本白话公羊传·穀梁传

主 编 王 宁

副主编 王贵元 叶桂刚

《公羊传》 评析、译 马志伟 金欣欣

审校 赵克勤

《穀梁传》 评析 史建桥

译 史建桥 贺 阳

审校 赵克勤

序

古书今译的工作，近年来经一些先辈师长的提倡，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也有一些专家身体力行，亲自执笔来从事这项工作，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译本，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对这一工作的不同看法仍然是存在的：古书是否有必要今译？能不能今译？仍有一些人持否定的态度。这是因为，从客观上说，历史上的文献典籍中积淀很深的文化内涵，绝不是通过简单的文言和白话的语言转换就可以传达竟尽的。而且，文言和白话虽然都是汉语，但却是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有了很大差距的不同时代的语言，要想完全对等的转换其实办不到，即使是水平再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语义上不得已的失落与添出也难以避免。类译文，总不如阅读原文更好。而从现实的情况说，如今社会上的古书今译的确非常杂乱，选材不问精华糟粕，译者不论对典籍是否进行过钻研，突击应付之作确实有之，有些译本或难点随便跳过，或成段删除原文，或随意编造译文——这种情况使一些学者颇为担心，直怕滥译下去会大量浪费纸张，无谓地消耗读者的精力，甚至贻误青年与热情的读者。

面临上述问题和分歧的存在，我们在接受广播学院出版社关于十三经与诸子的白话全译这一选题约稿时，曾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先秦（一部分已是魏晋）时代的经书与子书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过权威影响的典籍，其中大部分典籍历代学者都有讲述，出现了不少集大成的注本，又有大量训诂材料与之相应，翻译的依据不愁没有。但是，这些典籍文化积淀极深，相当一部分涉及典章制度、古代习俗的词语译文难以下笔，校勘、辨伪、诂训等问题还有一些未能定论，译者如无一定的积累，要读的参考文献是相当多的。诸子的问题还不只是文字诂训

问题，涉及古代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技……等专门问题，有些专门问题一部典籍里就涉及多种，领域极为宽泛。而且，熟悉经、子训诂的人都有体会：历代注家在选择注点时，都是从他们那个时代，用专家的眼光来选择的，而他们认为不需注解的，有些对现代人仍很难理解。其实，有些注家对疑难问题也有“绕着走”的时候，何况，也有的典籍注解很少或没有注解，一部分难点可资借鉴之先期成果难以找到，一些典故的典源，一时也很难查到，不敢妄加译文。既要全译，上述问题都无法躲开。有一部分典籍和一部分典籍的某些章节是首次翻译，正反面的启发都没有，全靠统观全书、参考同时代、同作者的其他著作来理解。这些困难，曾使我们不敢动手来作这一工作。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们对十三经与诸子的白话全译工作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人把古书的白话全译工作称为“普及工作”，其实，象十三经和诸子这样的典籍，即使译成白话，也不会被一般人当作普及读物来读的，这种白话译本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恐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需要通过经书和子书获得历史的借鉴而又找不到充裕时间通读艰深文言文的研究者作参考，在他们对典籍的原貌和全貌有所了解后，再来精读自己所需的那一部分。这样作，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和挂一漏万，另一方面，是使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对中国古代文献比较有兴趣的读者免去被文言文阻隔的困难，直接接触到经书、子书的全文，更快地提高文化素质。我们不能要求全社会都普及文言，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大量读文言作品，但了解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提高几代人的文化素质又势在必行，古书今译或能在某些方面对此起到一定的作用。何况，现在的今译，尤其是全译，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很缺乏，这一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至于译文能否周全地反映历史文化原貌、全然消除时代的文化隔阂问题，我想如果双语翻译，比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译可以部分地消除东西方异民族的文化隔阂，同一民族的时代隔阂恐怕不会更有甚者！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译文的准确度有不足处，只要继续努力，是可以得到逐渐的改进的。严肃的翻

译多了，粗制滥造的东西便会自然淘汰；不成熟的翻译如不继续改进，也会更好的译文代替，在这个过程中出一些昙花一现的译本难以避免，不能认为是浪费纸张。

我们这次约请的译者、评介者和审校者，在上述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这是译、校、评介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的保证。

这里，我们还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一）本书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和《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用世界书局原版重印本）为主要底本，说法有分歧的尽量选择一种公认正确的结论。实在难以确定的，一般以上述两部书及其训诂为准。十三经句读有疑难的，以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句读为准。不合以上三书之处，一般都加注说明，只有赵守正先生译的《管子》因所取底本为《四部丛刊》本，同时参照其他注本作过勘正，因此，原文与《诸子集成》不合之处较多，译文没有一一加注。

（二）本书绝大部分是新译，其中少部分在征得作者或代理人的同意后，选用了一些现成的译文（这部分在译者名字后用了“原译”字样）。这部分译文的选入大约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选了一些前辈学者的早年译文，以便吸取当时的翻译经验，例如高亨先生所译的《商君书》和《老子》，都是从早期译本中辑录的，杨伯峻先生所译的《论语》、《孟子》，我们是从他著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的第一次修订本上辑录的。二是选了一两部有影响的首次全译本，例如沈玉成先生译的《左传》、赵守正先生译的《管子》。三是在众多同一文献的译本中，选了几部有经验的作者的较新译作，例如黄寿祺、张善文先生译的《易经》、王世舜先生译的《庄子》和杨柳桥先生译的《荀子》等。这些译文在辑录入本书时，都经过一番统一体例的整理工作，并对译文作了不同程度的重新校订。

（三）为了尽量使译文合乎要求，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

（1）一律采用直译。从体现原著精神说，意译比直译更有利。但意译容易出现主观随意性，掌握起来有一定困难。我们是第一次对“十三

经”和“诸子”这样重要的典籍进行全译，经验不够丰富，积累还嫌不足，直译更便于忠实原著

(2) 译文不能足意或原文词语内涵较多难以择定译语的，另加必要的注释。本书注释是译文的注释，不是对原文注释的摘取。

(3) 译文一律不跳过词、句、段、章，实在难以翻译的词、文句和典故，采用阙疑的作法，加注存疑，使读者了解，并有利于专家师友指正。

(四) “十三经”与“诸子”中，都有一些典籍是不宜进行今译的。例如《仪礼》和《周礼》中有关典章制度和官职的名称，本身带有特定的含义，不可能有与之对应的现代汉语。又如《尔雅》，本是一部保存故训的“小学”专书，本来就无法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但是为了真正作到全面介绍“十三经”与“诸子”，我们也采用了一些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仪礼》和《周礼》中的一些带有特殊含义的词语，一般采用译文直出原词语而另加注释的方法以示其意。《尔雅》则仅用现代汉语转换训诂体例以明确训释词与被训释词的关系，另对一部分义训的训释词语改用现代汉语加以表述。被训释词一律不译，个别引文适当加注。

(五)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只印译文、不印原文的办法。这是因为，我们作为底本的《十三经注疏》和《诸子集成》发行时间都还不长，很多读者手中已经有了，不印原文，对多数读者说来，可以减轻一些购书的负担。在本书出版之后，是否需要再度进行校订、修改后，另出文白对照的注本，这恐怕要根据今后的情况而定了。

这次的工作，是文字训诂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哲学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和中国通史各领域作者的合作。为了培养人才和将这项工作长期延续下去，评析者和译者中，都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而审校者则多半是在某一方面有专长和有经验的专家。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作者对典籍的熟悉和理解还有不足之处，但大家严肃认真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本书的几位责编，曾为了约一部译稿或请一位作者冒着酷暑跑四五

趟郊区；有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写的札记比译文要多出几倍；许多审校的先生严格要求译者，审校稿被退回几次的不是一部两部，而译者从未不耐烦过；有些审校者与译者在一起切磋难点的译法，常常直到深夜……

尽管如此，限于我们的功底、水平，加之经验不足，本书的问题仍会很多，今后的校订修改任务还很大，我们诚恳地希望听到专家、师友和读者的批评。

王 宁

一九九二、三

目 录

《公羊传》

评 析.....	(3)
隐公.....	(16)
桓公.....	(26)
庄公.....	(36)
闵公.....	(53)
僖公.....	(55)
文公.....	(78)
宣公.....	(90)
成公.....	(104)
襄公.....	(117)
昭公.....	(135)
定公.....	(153)
哀公.....	(163)

《穀梁传》

评析.....	(175)
隐公.....	(185)
桓公.....	(194)
庄公.....	(204)
闵公.....	(222)

僖公.....	(224)
文公.....	(246)
宣公.....	(258)
成公.....	(268)
襄公.....	(281)
昭公.....	(299)
定公.....	(314)
哀公.....	(326)

公羊传

评 析

《春秋公羊传》是一部传解《春秋》的著作，又称《公羊春秋》，简称《公羊传》。它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早在汉代就有了很高的地位，深受人们的重视。从唐代起，被列为儒家的经典之一。

一、《公羊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关于《公羊传》的作者，正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正史上的最早记载是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汉书·艺文志》载：“《公羊传》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齐人。”唐代颜师古注：“名‘高’。”仅此而已。清代洪颐煊在《经义丛钞》中提出，“明”字古音读若“芒”，与“羊”同韵，“《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谓公明高也”；至于元代程端学，竟在《春秋本义》中臆断公羊高为汉初人。如此等等，都缺乏有说服力的材料。

唐代徐彦（一说为南北朝时人徐遵明），在何休自序“传《春秋》者非一”一句下解释说：“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故《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接着，他又引东汉戴宏《公羊传》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是，这类说法也存在很多疑问。就《公羊传》传自子夏一说而言，杨伯峻先生在《经书浅说》中指出：旧说《公羊》、《穀梁》俱出自子夏，既然如此，那么按理两书只应大同小异，互有详略，但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自相攻击。而事实上，“不但两传矛盾之处很多，而且有《穀梁》攻击《公羊》处。”他还指出：“‘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近人崔适也在《春秋复始》中指出：《公

羊传》之名与公羊氏之籍始见于西汉刘歆所撰《七略》，而公羊氏之世系及人名始见于戴宏的序，“何以前人不知，而后人知之也？”他又指出，从有关史料来看，子夏生于鲁定公二年，到汉景帝初已历三百四十余年，而公羊氏仅传五代。这样，每代相距六十余年。除非“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由此，崔适对戴宏所说的传承线索提出了疑问。此外，就《公羊传》本身看，书中多处出现“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高子曰”、“鲁子曰”等字样，已能说明书中见解不尽出自公羊氏。非惟如此，即使有些观点没注明来源，也未必尽出自公羊氏。比如《春秋》定公元年“戊辰，公即位”一句，《公羊传》自问自答曰：“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则曷为以戊辰之日，然后即位？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但从《穀梁传》来看，最后一句话却是沈子的原话。至于《公羊传》两次出现的“子公羊子曰”，则更明显是公羊氏以外的弟子后学称引先师的说法。由此可见，非但《公羊传》源自子夏说不确，即使是《公羊传》仅仅由公羊氏五世传承的说法也是不妥的。

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沈子等人与公羊子，以及他们与《公羊传》的关系呢？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的一段话似乎可对此作一解答。他说：“父传之子，师传之弟，则谓之家法。……学不足以名家，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虽笔之于书，仍为先师之说而已。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故有名为某家之学，而其书并非某人自著者。”所以，就现有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公羊传》的作者当是由先秦到西汉初的公羊氏子孙及沈子等一批儒生。由于《春秋》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以，当时只是口耳相传，直到汉景帝初年才写定成书。

二、《公羊传》的流传过程

《公羊传》成书后，结束了口耳相传的局面。汉景帝时它得立学官，

到了武帝时，春秋公羊学说开始受到重视，于是有更多的人钻研它。据《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以治《春秋》（按即《春秋公羊传》）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西汉初，研究、讲授《公羊传》的学者以胡毋生和董仲舒最著名。胡毋生字子都，汉景帝时博士，相传他曾协助公羊寿用今文隶书写定《公羊传》。何休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中说：“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可知胡毋生应有著述，只是未流传下来。董仲舒也是汉景帝时博士，专治《公羊春秋》。他曾勤学苦读，“三年不窥园”。著作有《春秋繁露》、《春秋决事》等书。董仲舒发挥《公羊》之旨，阐发了“大一统”、“天人感应”、“德刑并治”、“三纲五常”、“三统”、“三正”等等思想观点，对后代政治统治有着深远影响。胡毋生与董仲舒一生研读《公羊春秋》，教授弟子甚多。据《汉书·儒林传》载，胡毋生传公羊学于弟子褚大、段仲、吕步舒（以上三人《史记》谓为董仲舒弟子）、臧公，臧公传孟卿、眭孟、贡禹。孟卿传疏广，疏广传筦路，筦路传孙宝；贡禹传堂谿惠，堂谿惠传冥都；眭孟传严彭祖、颜安乐。尹彭祖传王中，王中传公孙文、东门云；颜安乐传冷丰、任公。东汉时，据《后汉书》载，公羊学说以严彭祖派观点为盛行，公羊学者中著名的有丁恭、甄宇、周泽、楼望、钟兴等等。

在汉代，传《春秋》的著作有多种，其中有影响而流传后世者有三：《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传虽同传《春秋》，而内容观点却各异。所以，谁得《春秋》之真谛，自然会有激烈的论战。据《汉书·儒林传》载，在汉代《公》、《穀》的论辩早在武帝时就开始了。《公羊》强调法治而《穀梁》强调礼治。由于汉初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尚不稳定，所以，公羊学派的以法治国、加强中央集权、对乱臣贼子无情镇压的政治主张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公羊之学因此得以兴盛。到了汉宣帝时期，社会相对稳定。武帝以法治国虽达到了强化统治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却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为此，强调礼治，重视宗法情谊的《穀梁传》开始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重视。这一转变突出地反映在

宣帝三年召开的石渠阁会议上。这次会议，《公》、《穀》之争《穀梁》派占了上风。如果说《穀梁》派的挑战只是使《公羊》派所保持的政治上的独尊地位受到了削弱，那么，《左传》对《公羊》的冲击，则属于根本上的否定。《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发现的一部用战国时代文字（古文）写的史书，它不同于《春秋》那种大事年表性质的记载，而是用简洁生动的文笔，比较系统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事件，记载的历史年代大致和《春秋》相当。（后来，晋代的杜预把它分年附在《春秋》后面。）刘歆认为这部书的作者左氏（左丘明）“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汉书·楚元王传》），价值自然远在《公》《穀》之上。为此，他上书皇帝，请将《左传》等几部新发现的古文经立于学官。此举立刻遭到以《公》《穀》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博士们的反对，理由是：《左传》不传《春秋》，不祖孔子。这样，绵延不断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从此开始了。东汉时期，郑众、贾逵分别作《长义》十九条、四十条，论《公羊》之短；李育则写出《难左氏四十一事》进行反驳。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之意，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以贬《左传》、《穀梁》，而何休的学生郑玄则“入室操戈”，写了《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一一发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公》《穀》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与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学派的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最终造成了两败俱伤的结果。

东汉时期，研究《公羊》卓有成就的当数何休。何休字邵公，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而尤专《公羊》之学。据《后汉书》记载，他曾花了十七年时间，“覃思不窥门，写成《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书，这是现存最古也是最精的注本，清代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公羊传》采用的就是这一注本。当何休作《解诂》之时，正是今古文经学派论争最激烈的时候。然而，此时的《公羊》学者对于《公羊》学说往往一知半解，却又多逞臆说，任意阐发。何休在《解诂》序中说：“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让嘲辞，援引他